

基于中心—外围理论对西安—咸阳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研究

郭力宇 (咸阳师范学院资源环境与科学系,陕西咸阳 712000)

摘要 应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中心—外围理论、集聚与扩散机制、城市发展阶段等理论,分析了西安—咸阳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指出西安—咸阳区域空间经济发展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同时人口、资本、信息等由传统的聚集机制转换为以扩散机制为主的发展格局。提出制度一体化、优势互补和错位发展一体化原则及具体产业的空间分工。

关键词 中心—外围理论;区域空间结构;集聚与扩散机制;西安—咸阳区域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F2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09)26-12762-03

Study on Xi'an-Xianyang Regional Integration Based on Center-external Theory

GUO Li-yu (Department of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Science, Xianyang Teachers College, Xianyang, Shaanxi 71200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Xi'an-Xianyang regional integration was analyzed using the center-external theory, centralizing-spreading mechanisms,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stages of the city development. It was pointed that the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of Xi'an-Xianyang had got into the stage of the later industrialization. Population,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were transferred from the centralizing stage to the spreading stage. And the principles of integrated institution,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misplaced development and the space division of the specific industry we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Center-external theory;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Centralizing-spreading mechanism; Xi'an-Xianyang regional integration

区域经济一体化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为标志,始于20世纪50年代,是地理区域上比较接近的2个或2个以上国家或地区,为了谋求共同的经济贸易发展,通过缔结条约而建立起经济贸易联合体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促使区域商品、货币、资本、资源等要素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的同时,能够最大程度体现不同区域商业群体及消费者意志,并且完善市场机制和程序,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协调发展,形成符合区域特征条件的合理、有效的产业布局^[1-3]。其中,协调的产业布局在一定程度上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关键。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产业布局合理与否的重要指标是地区产业结构是否存在趋同现象,是否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进而反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趋势^[4-5]。

西安、咸阳两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机械、电子、纺织为重点的产业趋同,这种地区支柱产业及相关产业结构的趋同化,演变为地区间的市场分割、重复建设,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调整适应未来发展的产业布局,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进程,使西安、咸阳既联合协作、优势互补,又突出特色,错位发展,从而形成自己的经济特色是目前必须面对的问题。笔者基于中心—外围基本理论思想、集聚与扩散机制和城市发展阶段等理论体系,分析了西安—咸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支撑及优先领域,旨在对西安—咸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提供思路与方法,并对类似的国内非对等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借鉴。

1 中心—外围理论与区域经济

1.1 中心—外围理论 中心—外围理论亦称为核心—边缘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展经济学在研究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时所形成的相关的理论观点的总称。不少学者使用“中心”和“外围”这一对概念来分析世界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格局,并提出解决它们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政策设想^[6-7]。

1.2 中心—外围理论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中心、外围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后来被引入区域经济的研究之中,融入了明确的空间关系概念,形成了解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关系和空间模式的中心—外围理论。其中,在若干区域之间会因多种原因个别区域率先发展起来,形成资本、信息、劳动力等相对集中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发达区域,该区域被称为“中心”;其他区域则因发展缓慢而形成为“外围”。中心与外围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总体上,中心居于统治地位,而外围则在发展上依赖于中心。

中心对外围之所以能够产生统治作用,原因在于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贸易不平等,经济权利因素集中在中心。同时,技术进步、高效的生产活动,以及生产的创新等也都集中在中心,中心依靠这些方面的优势而从外围获取剩余价值。对于外围而言,中心对它们的发展产生压力和压抑,外围的自发性发展过程往往困难重重。更重要的是,中心与外围的这种关系还会因为推行有利于中心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使外围的资金、人口和劳动力向中心流动的趋势得以强化。同时,中心的发展与创新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心存在着对创新的潜在需求,使创新在中心不断地出现。创新增强了中心的发展能力和活力,并在向外围的扩散中加强了中心的统治地位。

有6个自我强化、反馈的效应支持中心的成长,分别是主导效应、信息效应、心理效应、现代化效应、连接效应和生产效应。主导效应是外围的自然、人文和资本资源向中心的净转移;信息效应是中心内部信息的集聚在传播和反馈过程中对现实、潜在经济活动价值的增加;心理效应是创新的成功对更多创新的刺激作用;现代化效应是中心为适应创新而发生的社会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转化;连接效应是一个创新引起新的创新趋势;生产效应是为创新而提供有吸引力的结构支持,包括经济规模的增长和专业化。信息效应和心理效应常常与主导效应相伴随,而现代化效应则与连接效应和生产效应密切相联。在这些效应的作用下,中心不断地成长,相比之下,外围的发展将处于不利地位。

基金项目 咸阳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07XSYK218)。

作者简介 郭力宇(1963-),男,陕西临潼人,博士,副教授,从事城市地理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收稿日期 2008-12-29

1.3 中心—外围理论的集聚扩散机制

1.3.1 集聚机制。集聚是资源、要素和经济活动等在地理空间上集中的趋向与过程^[8-9]。集聚机制的形成源于3个方面:①经济活动的区位指向。区位指向相同的经济活动往往都趋向于集中在同类区位,这就带来经济活动在少数地方的集聚;②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出于加强相互联系的需要,一些内在联系紧密、相互依赖性大的经济活动往往趋向于集中在某一适宜地区;③经济活动对集聚的追求。各种经济活动为追求集聚经济也需要在空间上趋于集中。可见,集聚机制的形成是必然的。集聚过程一旦开始,就极易形成循环因果式的促进集聚的力量,从而加速集聚过程。

集聚能够产生集聚引力。在集聚引力的作用下,区域经济在空间上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①集聚将导致区域的极化,并随着资源、要素、企业、经济部门等将不断的向优势区位移动,而加剧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与不平衡。②集聚是促进发达地区、城市、城市密集区、专业化地区、产业密集带等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力量。③集聚还能够引发和加剧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专业化地区与一般地区等之间形成发展关系上的“马太效应”,即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1.3.2 扩散机制。扩散机制的形成源于以下几方面:①避免集聚不经济。所谓集聚不经济就是当集聚规模超过了一定限度而发生的集聚经济效益减少、丧失,以及因集聚而带来的外部环境对经济活动的负面约束现象。如人口稠密、地价上涨、交通拥挤、生活费用和生产大幅度上升、环境污染等。面对这些问题,一些经济部门以及相关的资源、要素就不得不从原来的集聚地区迁移出去。②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如集聚地区的部分企业、经济部门为寻求进一步的发展,主动到周围地区建立分支机构或新的发展据点;集聚地区部分企业和经济部门为了减小竞争压力不得不其他地区开辟新的市场;集聚地区在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被淘汰下来的部分企业和经济部门到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去寻求立足之地。③政府的政策作用。地方政府为了解决集聚地区因经济活动过密、人口膨胀而引起的种种经济、社会、环境问题,缩小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制定出一系列政策,诱导和鼓励集聚地区的资源、要素、企业、经济部门等向其他地区扩散。总体而言,扩散机制将促进资源、要素、企业、经济部门在空间上趋于相对均衡,有利于逐步缩小区域内部的经济水平差异,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在区域空间结构形成与发展的不同阶段,集聚与扩散机制发生作用的强度不一样。在区域空间结构形成初期,外围向中心的集聚机制起着主导作用,引发区域内部发生空间分异;当区域空间结构进入成熟期,一般情况是中心向外围的扩散机制的作用强于外围向中心的集聚机制。西安、咸阳区域空间经济发展现处于不同等级中心共同向外围扩散作用占主导的阶段,标志该区域空间经济发展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

2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

2.1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阶段 区域空间结构是在一定发展时期和条件下区域内各种经济组织进行空间分布与组合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发

生着演变。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依据其工业化水平可划分为4个阶段^[10-11]。

2.1.1 前工业化阶段。这个阶段代表了工业化之前的时期。区域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区域空间均质无序,其中有若干个地方中心存在,但是它们之间没有等级结构分异。由于这个时期区域的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极不发达,总体上处于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对应的区域空间结构是由一些独立的地方中心和广大的农村所组成的,每个地方中心都占据一块狭小的地方。区域内部各地区之间相对封闭,彼此很少联系。

2.1.2 过渡阶段。这个阶段是工业化的初期。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某个地方经过长期积累,因外部刺激而获得发展的动力,经济快速增长,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了该区域经济的中心。这个中心的产生就打破了区域空间结构的原始均衡状态。在这个阶段区域空间结构由单个相对强大的经济中心与落后的外围地区所组成。该中心以其经济发展的优势吸引外围地区的要素不断向它集聚,越来越强大,而外围地区则更趋向落后,从而致使区域空间结构日趋不平衡。

2.1.3 工业化阶段。在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展,在区域的其他地方产生了新的经济中心。这些新经济中心与原来的经济中心在发展上和空间上相互联系、组合,形成了区域的经济中心体系。由于每个经济中心都有与其规模相应的大小不一的外围地区。这样,区域中就出现了若干规模不等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些中心—外围结构以各自的中心在经济中心体系中的位置及关系,相互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该区域的空间结构。在这个时期,区域空间结构趋向复杂化和有序化,并对区域经济的增长有着积极的影响。

2.1.4 后工业化阶段。在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区域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日趋紧密和广泛。同时,不同层次和规模的经济中心与其外围地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缩小。所以,区域内就逐步形成了功能上一体化的空间结构体系。随着中心与外围地区界限的逐渐消失,区域将最终走向空间一体化。

2.2 西安—咸阳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 西安、咸阳是我国黄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与雅典、罗马、开罗并称为世界4大古都,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10世纪左右,先后有13个朝代或政权在此建都及建立政权,历时1100余年。

咸阳是周、秦王朝的都城。公元前350年,秦孝公推行商鞅变法,将西周都城从沣渭迁到现今的咸阳市,经过秦惠王、悼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和庄襄王5代,一直到秦始皇统一7国,咸阳作为战国秦和秦王朝的都城长达144年。西汉之后,东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1个王朝建都于今西安市,历经1000年历史。中国是以农耕文化为特征的古国,王朝都城的建立是早期人口、物质、资金聚集形成中心地过程的主要动力。也就是说,西周至秦王朝期间,咸阳市是以聚集作用为主的中心地,秦王朝时达到顶峰;西汉至唐王朝期间,西安市同样是以聚集作用为主的中心地,唐王朝时达到顶峰。但由于在前秦时期,中国是以农耕活动为主要生产方式,户政制度严格,生产力落后,

致使人口、物质向西安、咸阳两中心地的聚集作用有限,都市规模较小。因此,此阶段的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相当于前工业化阶段。

秦王朝之后,王朝都城迁移,西安、咸阳中心地聚集效应强度降低,都城规模发展进入相当停滞的过程。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城市发展进入快车道时期,西安、咸阳两地城市工业化布局加快,城市聚集作用不断加强,城市人口、用地规模不断扩大。此阶段,西安、咸阳两中心地的发展以外围物流、人流、资金流向中心地聚集,中心地规模不断扩展为特征,两地的外围区农业用地大部分转变为城市用地,在功能上形成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体系,此阶段的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相当于工业化城市发展阶段。

建国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工业化全局的需要,国家在陕西关中布局了以机械、电子、纺织为重点的一批大型建设项目,西安、咸阳是这些项目分布的主要地区。当时的项目规划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两市产业的趋同,这种地区支柱产业及相关产业结构的趋同化,造成小规模、高成本、低收益的结果。资源浪费巨大,并加剧了地区分割和地区保护主义,造成地区资源的浪费、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不利于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演变为地区间的市场分割、重复建设,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进步,降低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

随着西安、咸阳两市工业化进程的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西安、咸阳两市发展出现了许多城市问题。交通拥挤、人口高度稠密、城市地价飙升、城市热岛现象强烈、人口与环境的矛盾加剧,以及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问题日益严重。此时,在市场经济作用及政府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西安、咸阳中心地扩散—溢出作用的需求开始变得极为强烈,促使西安、咸阳两中心地与其外围实施一体化发展。现今,西安、咸阳一体化就是传统以聚集作用为主导的城市发展建设向以扩散作用为主导的城市发展建设的转换,是西安、咸阳两城市中心地的物流、人流、资金流聚集向城市外围扩散的转换,是以地域特征为前提,实施互补协调发展的自然选择。西安、咸阳经济一体化发展,标志着西安、咸阳空间经济结构体系演化迈入后工业化阶段。

3 西安—咸阳区域一体化的优势与发展对策

3.1 西安与咸阳的优势 西安、咸阳两市地处陕西关中地区,秦岭北麓,渭河沿岸,两市近东西向相邻展布与延伸。西安是陕西省省会,咸阳东侧,渭河之南,区域发展已扩展为东西最长204 km,南北最宽116 km,全市面积9 983 km²,其中市区面积1 066 km²;人口608.89万人,其中市区非农业人口达275.67万人;除新城、碑林、莲湖、灞桥、未央、雁塔等老城区外,现还辖管阎良、长安、蓝田、临潼、周至、户县、高陵等县区;西安城市交通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已呈现出多层环状为主的格局。咸阳位于渭河之北,西安东侧,两市中心区相距仅约30 km;咸阳市下辖2区10县1个县级市,面积达10 196 km²,人口494.3万人,市区非农业人口达53万人。西安、咸阳两市从城市空间、人口分布及城市交通上已基本是无缝衔接,两市的综合统一规划、经济一体化发展将是必然的趋势。

同时,西安市以政府行政办公区、高级商品销售为特色的中央商务区、高校研究机构、高新开发区、城市旅游、国际

会展中心布局为特征,出现人口稠密、交通堵塞、空气质量下降、地租抬升等城市发展问题,城市环境超载严重。其西侧的咸阳市则具有充足的能源、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咸阳水、火电装机容量为140万kW,输变电线路与西北地区联网;煤炭储量达120亿t,原煤生产能力300多万吨;同时咸阳水源丰富,境内有河流8条,地表水径流量达70多亿m³,地下水综合补给量10亿m³,有温泉12处,地下热水深井9处。咸阳土地总面积约101.96万hm²,按地貌特征可分为土石山地、丘陵地、原地和川道4大类;土地类型丰富,耕地面积约40.70万hm²,园地约11.85万hm²,林地约17.98万hm²,牧草地约2.28万hm²。咸阳境内已发现的矿产资源多达22种,已开发利用10种,主要有煤、铁、石灰石、石英砂岩、陶土、油页岩及石油等。

咸阳丰富的能源与资源为整体空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为空间区域分工提供了地理依据,为西安城市中央—核心经济、教育、高薪、金融等现代城市区的发展提供支持。并且显示出自身粮食、蔬菜、油料等城市供给区,以及城市居民商住区、能源供给区、旅游城市休憩区的区域服务分工特色。

3.2 西安—咸阳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对策

3.2.1 区域一体化思路。

(1)成立统一的协调、组织机构,制定和实施统一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形成制度性一体化,促进功能性一体化,实现真正意义的空间经济一体化。

(2)根据优势互补和错位发展的原则,西安、咸阳2市在产业发展上,对于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的产业应当以强势地区和企业为主体进行整合,构筑地区优势产业,实现互补双赢。

(3)以和谐、协调区域产业分工铸造富于活力、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发展区域。

3.2.2 区域一体化发展对策。

(1)发挥陕西省会都城与咸阳资源、空间优势,构筑西安以区域政治、第三产业为中心和咸阳以现代经济(企业)活动为中心的区域两中心的一体化发展。

(2)西安应充分发挥区位资源优势,尤其是科技、人才优势,立足现有基础,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国防科技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等,把西安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科技领地、人才高地、国际性旅游城市和区域性商贸、金融、信息中心。

(3)咸阳市突出新兴工业城市特色。总体应当依托大型企业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重点发展光传输设备、光电子器件、偏转线圈;以现代中成药和生物制药为重点,加强医药保健品和医疗器械的开发生产;以新型方便食品、乳制品、果汁饮料为重点,发展食品工业,建成陕西食品工业及特色农业、城市近郊旅游、城市休憩、医药保健基地。

(4)加强城市基础服务设施的统一规划和建设。其中在西安二环、三环、绕城(四环)高速城市交通的基础之上,应再建设以包括咸阳、泾阳、高陵、临潼等次级城市的5环高速城市交通、南与秦岭北麓的环山高速城市交通相接,提高咸阳

(下转第12770页)

动,大力引进优秀旅游人才,特别是经营管理和营销策划人才。建立市、区县和企业 3 级培训网络和多层次培训体系,加大旅游人才培训力度;切实做好中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探索涉外旅游培训工作;改善培训方法,提高培训效果,增加培训工作的吸引力。

2.3 采取措施对游客数量进行有效的调控 环境容量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影响因素很多。即使在游览人数相近的情况下不同素质的旅游者及不同管理水平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是有较大的区别的^[3]。首先,应加强景区的管理,引导旅游者自觉爱护环境,建立旅游活动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关系。其次,建议采取以下的措施:淡旺季采用不同的价格,利用价格杠杆以淡季较低的价格吸引旅游者。在旅游的平淡季举行大型活动来吸引大批的旅游者。预测旺季的旅游人数及可能出现的超载情况,引导旅游者避开高峰选择更为适当的时机出游。在旺季限制入园游览的人数,每天定量发售门票,在超载严重的景区进行限时开放。

2.4 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对各种资源进行整合 ①旅游部门要敢于和善于牵头,主动沟通和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系,取得各方面的支持,形成整体合力。②充分发挥张家界市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减少因行政隶属关系而出现的内耗和摩擦。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序发展,科学管理”原则,以武陵源为核心旅游区,以永定城区为核心旅游服务区,以慈利县为旅游东线,以桑植县为旅游西线,实现核心牵引、东西联动、协调发展。武陵源区作为张家界的旅游核心区,应该突出抓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的生态保护;永定区是游客集散中转中心,应以旅游接待服务为其主要职能,辅之以民俗旅游和旅游商品开发,可开设特色鲜明的美食街、购物街,文化娱乐街等;慈利县应以温泉资源为凭借,主要开发康体、休闲度假旅游产品;而桑植县应以发展红色旅游为主,辅以生态观光产品。

2.5 优化旅游产业结构 张家界旅游产业现在应着重弥补这一产业链条中薄弱的环节即旅游购物环节。本土企业要

(上接第 12764 页)

的可进入性;另外,西安、咸阳间的渭河城市河段应统一规划建设;并且,城市用水、通信、教育、城市公园、居民购物中心、城市公园与居民休闲区、现代城市功能合理分区等的综合统一规划与建设应成为重点,最终实现西安、咸阳的城市区域经济可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5) 西安、咸阳两市的合并与政府机构管理效率的提高。咸阳置于战国时期,当时为县级行政区,秦孝公十三年(公元前 349 年),迁都咸阳,咸阳成为秦的首都。至西汉时期,由于渭河侧向侵蚀不断北移,在渭河之南的秦代离宫基础上,设置长安县,迁都长安,兴建了长安城。咸阳与西安行政区是在自然环境变迁的因素下形成的,这种沿袭古都的相邻城市行政区在生产力水平和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的阶段区域发展的矛盾并不显现。随着生产力水平和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沿袭古都的相邻城市行政区的弊端和矛盾极为明显,尤其在咸阳西安城市中心相距不到 30 km 的区域空间,区域发展受到严重的制约。因此,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根本途径之

彻底改变以往的设计营销方式偏重于国外游客的不合理状况,应针对不同消费层次将商品分为不同档次;同时在价格上也形成合理梯次。积极建立完备的旅游商品售后服务体系,其中包括了对游客售后服务满意程度的跟踪调查,获取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要求和意见,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旅游者建立完备的资料等。

2.6 科学开发旅游产品 实施“山水自然风光—民族民俗文化”的组合产品策略,进一步做好自然生态型旅游产品质量提升的同时,把张家界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奇特的民族民俗文化和厚重的人文社会历史深度挖掘出来,培育“自然—人文”的新品牌旅游产品,深度开发自然生态型旅游产品,打造精品生态旅游地带和生态旅游区域。

实行跨区域产品连线。在充分发挥张家界的旅游特色基础上,广泛与国内外热点景区,特别是世界遗产区连线,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产品。加强旅游宣传促销,不断拓展旅游市场。拓宽壮大国内市场,巩固发展韩国市场,加快开发港、澳、台、日本、东南亚市场,努力开辟欧美和澳洲市场。

2.6 旅游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张家界积淀着极其宝贵的历史和民族文化资源,在城镇规划与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尊重和吸收自身蕴含的这些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由此形成新的具有浓郁风情与特色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效果,促进城镇文化品味的提高。根据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结构特征,张家界市区应以特有的山水环境为背景,中心区以澧水河为主轴,主城区外围以环形、楔形绿地结合形成城市生态网络,形成“城在绿中,绿在城中”,达到山水、花草、森林、城市与人融为一体^[3]。

参考文献

- [1] 张家界市统计局. 张家界市统计年鉴 2006 [M]. 长沙:湖南出版社, 2007.
- [2] 韩春鲜. 干旱地区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D].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 2006:69.
- [3] 彭鹏, 周国华, 王凯. 张家界旅游业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J]. 热带地理, 2005, 25(1):73~76.

一就是将两市合并,形成统一的政府机构管理。

参考文献

- [1] 何念如. 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研究(1979~2005) [D]. 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 2006.
- [2] 苗建军. 论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道路 [D]. 成都:四川大学图书馆, 2003.
- [3] 石亿邵. 都市经济圈:一个新的国家城市化发展战略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2(9):17~20.
- [4] 蒋伏心.“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与南京经济发展 [J]. 南京社会科学, 2003(S1):413~416.
- [5] 林涛, 谭文柱. 区域产业升级理论评价和升级目标层次论建构 [J]. 区域研究与开发, 2007, 26(5):16~22.
- [6] 李小建, 李国平, 曾刚, 等. 经济地理学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 [7] 黄金辉, 程治中. 构建以大都市圈为主导的中国城市化模式研究 [J]. 理论与改革, 2004(2):84~86.
- [8] 刘丽琴, 刘文秀, 李成固. 城市规划与城市土地经营协调机制研究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7, 26(5):70~74.
- [9] 吴宇华. 论地域结构模式 [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0, 19(1):9~11.
- [10] MICHELLE P E. Constructing a European market: stand - ards,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M]. Oxford, US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11] ALAN O SYKES. Product standards for internationally integrated goods markets [M]. USA: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0.